

对近期中欧关系困境 的思考

[内容提要] 2008年,中欧关系经历了近年少有的困境。困境的直接原因是欧盟大国对华外交中的价值观转向,而深层原因则是中欧在经贸、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国际战略和外交领域的矛盾逐渐增多,中欧关系将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但是,经贸关系中高度的相互依赖和互补性、国际国内问题上的广泛合作和双方制度化的合作网络构成了中欧关系顺利发展的比较坚实的基础。在近期,处理好中欧关系中的几个问题,才能推进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和稳定地发展。

[关键词] 中欧关系 困境 思考

中图分类号: D82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1369(2009) 2- 0064- 07

2008年11月28日,中国政府因法国总统萨科奇将会见达赖而推迟原定于12月1日举行的第11次中欧领导人峰会。12月6日,萨科奇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以欧盟轮值主席国元首身份在波兰会见了窜访波兰的达赖并号召欧盟国家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作为回应,德国、英国、捷克、波兰等国都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言论,把推迟峰会的责任归因于中国。此后,中欧关系经历了一场近年来少有的困境。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的春节期间访问了欧盟总部并商定要尽早举行中欧领导人峰会,而英、德两国则相继缓和了对华关系,中欧关系正在走出困境,恢复正常。本文以此为起点,首先分析近期中欧关系困境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本文认为,中欧关系的暂时困境不能动摇中欧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并对发展中欧关系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对策。

近期中欧关系发展困境的原因

1. 近期中欧关系困境的直接原因

近期中欧关系出现困境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欧盟大国对华外交中的价值观转向。欧盟对华外交有利益外交,也有价值观外交,欧盟总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大致的平衡,在过去,相对面言,欧盟更注重经贸问题和利益外交。但自2006年以来法德英新领导人上台后,价值观外交逐渐开始占上风。欧盟中这三大国的领导人萨科奇、默克尔和布朗上台伊始,面对的就是一个对欧盟有巨大贸易顺差的、与欧盟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强大的中国。他们认为中国“不民主、不自由但是经济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如何对付中国,欧盟的特长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用其擅长的“软权力”,用其“民主和自由”对抗中国的“不民主、不自由”。萨科奇、默克尔和布朗无一例外地视中国为非民主国家,刻意渲染与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借人权和宗教等问题向中国发难。

收稿日期: 2009 03 05

作者简介: 卢晨阳,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100875。

2008年,这三个国家,尤其是德法两国,以插手西藏问题、扰乱奥运圣火传递、抵制奥运会开幕式、会见达赖等多种方式制造了中欧关系中最近几年少有的波折。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在这其中,与欧盟大国的关系往往是中欧关系的比较可靠的晴雨表。所以,以中国与法德等欧盟大国的关系陷入困境为主要指征,中欧关系经历了一场近年来少有的困境。进入2009年后,深陷经济泥潭的英、德两国相继采取措施,全面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月22日,英国通过了首份对华政策文件《英国与中国:合作框架》,将发展对华关系视作英国今后数年外交工作的“重大优先目标”,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国认为未来十年中中国为英国商界提供的机会可能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此后,英国首相布朗还声称中英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月29日,温家宝总理访问德国时中德双方通过了《中德关于共同努力稳定世界经济形势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只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的声明而避谈容易引起分歧的政治问题。英、德两国的外交举措其实昭示着在价值观外交屡屡碰壁后,欧盟大国的对华外交正在逐渐回归传统的利益外交,欧洲需要中国帮助它们渡过金融危机,这远比价值观外交重要。而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法国仍在一意孤行地徘徊。

2. 近期中欧关系发展困境的深层原因

价值观外交的出现固然和欧盟大国最近几年的领导人更替有关系,但作为欧盟制约崛起的中国的重要手段,它绝对不会在短期内销声匿迹。相反,它会或隐或现、间歇性地对中欧关系制造麻烦。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最近欧盟对华关系从价值观外交向利益外交的回归不会是永久的,甚至不会持续较长时间,因为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正在增多。

首先,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引发欧盟对中国崛起的担心。进入21世纪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欧洲和大西洋的影响力日渐削弱,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亚洲的崛起对西方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具体到中欧关系,欧盟因为缓慢的

经济发展和相对滞后的外交与安全合作而难以成为“全球性欧洲”(布朗语);而持续、快速上升的实力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的崛起使欧盟备感压力,而消解这种压力的重要途径就是高举“价值观外交”的旗帜,以阻滞中国的崛起。另外,中欧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和“西藏问题”一直存在,而这两个问题在2008年中欧关系中的凸显,从某种程度而言,是欧盟人为“制造”的,是用来反制中国的有利工具。这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欧盟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和对自己地位的忧思。

其次,中欧经贸领域的摩擦逐渐增多。互利双赢的经贸关系一直是中欧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中欧贸易本来互补性很强,双方也都从这种互补性中受益匪浅。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研发能力增强,双方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演变。中国不但自己能生产原本从欧洲进口的东西,还开始向欧洲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比如近年来中国向欧盟出口增长最快的是机电设备和电子产品。同时,最近几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逐年增大,2006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1282亿欧元。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60%是非中国公司(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公司)生产的,也就是说欧盟在华的跨国公司自己制造了一部分贸易逆差。但欧盟并不愿意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相反,2006年的欧盟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中,首次将贸易文件单列发行并明确认为中国对于欧盟贸易政策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挑战”。欧盟认为造成中欧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中欧之间没有互惠的自由、开放和公正的市场。欧盟还指责中国在环境、社会保障、知识产权保护和转移等方面的政策对欧盟企业造成了不公平竞争。

第三,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历史文化的差异引发的摩擦增多。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欧盟是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集团,两者的政治、社会制度完全不同。欧盟认为民主政治体制必须要包括代议政府制度、普选制度、竞争性政党制度、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制度等等。所以欧盟从根本上就不愿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甚至有时对中国政

治民主的发展置若罔闻。但是,长期以来,发展经贸关系一直是欧盟对华关系的重点,政治关系往往从属于经贸关系。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性议题比如人权、西藏、台湾问题等并没有给双方关系带来巨大困扰。欧盟经常表示“关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而较少公开指责。但是,最近几年,欧盟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导致它会主动过渡到欧盟所希望的西式民主,这使得欧盟官方层面对中国的认知渐趋消极。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在20世纪90年代,相对于美国而言,欧盟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态度一直比较积极。1997年以后,欧盟放弃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提案谴责中国人权问题的做法,开始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此后,在各个场合,欧盟基本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显著改善。然而,2006年之后,欧盟老调重弹,表示欧盟“极为遗憾中国在一系列领域几无进展”。欧盟还认为,“在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方面,中国的人权现状与国际普遍认可的标准仍有很大差距”^[1]。另外,欧洲议会对最近几年的中欧关系更是起到很坏的负面作用。2003年欧洲议会通过了《对亚洲战略报告》,强行塞进9条涉台内容;2005年欧洲议会通过有关决议案,反对中国提出的《反分裂国家法》,强烈建议维持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售;2008年,欧洲议会又通过各种方式呼吁抵制奥运会;在西藏问题上,甚至有35名欧洲议会议员为配合达赖的演讲而上演了“绝食”闹剧。当然,为什么欧盟喜欢在人权、西藏和台湾等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一方面是为了制约中国,另一方面这和欧盟惯有的历史优越感和价值观优越感有很大关系。“欧洲文化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一直是以一种自我认定的强势文化态势向世界各地扩张,欧洲人更是将他们对社会和事物的理解带到世界各地”^[2]。欧洲人习惯于用自己的人权标准来衡量别国的人权状况,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维模式观察和评论别的国家。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它们在前几年与美国之间的紧张,还是一个时期以来对俄罗斯的强烈不满和轻慢,或者是当前对中国的某种疏离,一定程度上有共同的根源”^[3]。欧洲人还经

常自誉为价值观教师,热衷于“纠错”和“指导”别的国家。欧盟一直希望中国能够按照欧盟的标准,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有巨大的进步。但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欧盟的截然不同,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解和欧盟也有相当差距,我们自然不会按照欧盟的标准推进我们的民主政治。所以,在这一点上,欧盟的挫败感和失望感也在增加。

最后,外交领域的矛盾增多。冷战结束以来,相对于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中欧关系因无各种历史、现实和地缘问题的羁绊而发展迅速。但最近几年,中欧间在外交领域潜在的矛盾增多。首先是非洲问题。非洲的很多国家曾经是欧洲大国的殖民地。殖民的历史早结束了,但欧盟大国依旧把非洲看做是自己的“后花园”。最近三四年中,中国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主要制度框架,大大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政治磋商、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而中非间这种互利双赢的合作被欧洲大国认为是“挖墙脚”。德国联盟党亚洲战略文件说,“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尤其引人注目。它在那里闯入了西方撤走后留下的真空”,“这给德国经济、外交安全和发展政策带来了严重后果”。^[4]其次,欧洲一直以自己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为自豪。但近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逐渐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欧盟认为,这其实也是降低了欧洲模式的吸引力。还有,在国际能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欧盟对中国的不满增多,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甚至和中国国力不相符国际责任。

综合国际体系的变化、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各种因素,可以认为,近期的中欧关系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蜜月期”,进入摩擦期和困难多发期。

中欧关系能够顺利发展的基础

从当下来看,中欧关系正在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但我们也不能据此就推断中欧关系会倒退或者陷入持续的困难。相反,正如温家宝总理在

剑桥大学的演讲中讲到的,中欧关系“基础坚实、前景光明”。^[5]笔者认为,尽管有种种矛盾,但中欧关系还是具有比较坚实的基础,中欧关系的顺利发展是中欧关系的主流,具体原因如下:

1. 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很高、互补性很强

近年来,中欧经贸关系虽然摩擦不断,但相互依赖程度依旧很高、互补性很强。至2006年,中欧贸易规模在30年中增长了112倍,远远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规模70倍的平均增幅。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过去15年中,欧盟对华出口增长了600%。从2000—2005年,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长了69%,而出口到欧盟的贸易额已经占中国总出口额的近1/5。从中欧商品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向欧盟出口的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照明装置、五金工具、家具、钢铁制品等机电产品以及服装、纺织品、鞋类、箱包、玩具、塑料制品等普通轻工产品,而欧盟输往中国的则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如汽车、飞机及零配件、船舶、有机化学品等。双方进出口商品的互补性极强,这种强互补性使中欧双方对彼此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欧盟还是我国第四大外资来源地。欧盟在继续加强与沿海地区经济合作之外,还积极参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部分欧盟企业正在将其在华生产和研发基地转向劳动力、土地等成本更为低廉的西北和东北地区。中国在欧盟的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规模较小,但中国在英国、德国、西班牙、丹麦等国的直接投资也正在蓬勃开展。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欧盟是我国累计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占中国引进技术的近50%,欧盟也是我国先进技术与设备引进的累计最大供应方;而中国是欧盟最活跃的科技合作伙伴。^[6]除了很强的互补性和相互依赖性之外,中欧之间还建立了完善的经贸合作机制。除了1985年《中欧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框架下建立的正部级经贸混合委员会外,各工作组涵盖了竞争政策、海关合作、教育与文化领域、能源领域、环境领域、知识产权、海上运输、产业政策调整、贸易政策、纺织品贸易、科技与空

间合作等等多个领域的中欧对话机制。这些对话机制是中欧解决经贸问题、协调立场、处理分歧和促进经贸合作的重要机制。近年来,中欧经贸对话和交流的制度化的程度进一步加强。2008年4月,中欧之间还建立了副总理级、一年一次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王岐山称,双方就经贸领域的战略性、前瞻性和规划性的问题进行对话,并且这种对话不替代、不重复、不削弱中欧已有的各种对话机制。另外,每年一度的中欧领导人峰会对中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中欧之间密切的经贸联系和制度化的经贸交流机制为中欧政治关系乃至整体关系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认为,强大的经贸关系可以制约外交冲突的扩散,使其保持在可控、可持续、可预见的范围内。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去年后半年中欧关系因西藏、民主等问题出现较大波折后,近期中英、中德关系的恢复都是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

2. 在国际和国内问题方面,双方有广泛的战略共识和合作领域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在各个方面尽显疲惫之态,但还是执意想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单级世界。而中国和欧盟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和国家集团,有共同的国际战略目标,那就是各自都反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主张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中国和欧洲都寻求限制美国的权力和霸权,无论是通过创造一个多极世界,还是通过多边地实行对美国的制度约束”^[7]。从地缘政治来看,中欧之间相距甚远,没有特殊的利益联系,也没有特殊的利益冲突,中欧之间没有历史问题、边界问题的困扰,所以,中欧之间有相对超脱地发展全方位关系的良好地缘政治条件。从更高层次上讲,中欧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一些全球问题如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核扩散、恐怖主义、地区冲突和危机等问题,都需要中欧携手才能较好解决。

中欧双方还在教育、科学、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领域。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在看似分歧很大的人权问题上,中欧间也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合作对话机制。1997年,中欧建立了在欧盟轮值主席国领导下每年两轮的中国-欧盟人权对话机制,到2008年6月已经进行了25次人权对话。双方还创建了中欧司法研讨会(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该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在专家层面展开公开、专业的讨论,以期促进双方的官方对话。人权研讨会至今已经举行了17次。这样的对话和交流为消弭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误解、增进了解和理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 中欧间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框架

从1995年至今,欧盟已经发表了六个对华战略和政策文件。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第一个全面的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关系长期政策》,这是欧盟调整对华政策,提升对华关系的重要标志。此后,1998年、2000年、2001年、2003年和2006年,欧盟又接连发表五个对华政策文件,中欧关系也经历了“建设性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三个里程碑式的发展。作为回应,中国方面在2003年发表了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是中国首次针对一个地区发表的政策性文件,表明中方对发展和促进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

为了进一步落实中欧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欧间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话和交流机制。1998年中欧之间启动了每年一度的中欧首脑会晤机制,至今已经举行十次峰会,2008年暂时中断。中欧间还建立了20多个外长级、大使级、政治司长级和专家级等多层次的定期对话机制。欧盟的“三驾马车”与中国的外长级会晤每年举行一次或者两次。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与中国驻欧盟大使、中国外长与欧盟驻华代表团之间每两年也有一次会谈。2005年12月,中欧之间成功启动了副外长级的中欧战略对话,至今已经进行了四次。2008年,中欧间启动了“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今年4月将进行第二次对话。这些定期对话机制对话的议题除中欧关系中的所有问

题外,还扩大到地区安全、军备控制、防扩散、打击非法移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非常广泛的领域。此外,在多边领域,在亚欧会议机制下,中欧之间也有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在联合国框架内,中欧也有深入的沟通与协调。中欧之间的这种制度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联系和交流已经在中欧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有韧性的合作的网络,这种网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各种负面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冲击。

现阶段发展中欧关系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1. 不扩大也不缩小矛盾和摩擦,全面看待中欧关系

中欧关系中有不少摩擦和争议,这种摩擦和争议是非常正常的。中欧间历史文化的不对称、经贸关系的摩擦、政治制度的差异、处理国际问题方式方法的不同,都有可能导导致持续时间或长或短、范围或大或小、程度或高或低的矛盾和摩擦,这是中欧关系的常态,也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对中欧关系,要历史地看、发展地看。不能用短期的或者个别的摩擦来判断中欧关系的走向。比如2008年11月,因萨科奇坚持会见达赖引发中法关系出现波折,而法国当时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地位又让中法的矛盾延伸到中欧关系的层面上。但这种状况不能定性为中欧关系的全面倒退,而只是表明中欧关系出现了暂时的困难和波折。其实,仅仅两个月后,中欧关系已经开始缓解。2009年1月19日,中欧间如期举行了第四次战略对话。1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春节期间访问了欧盟总部和欧盟四国。在访问欧盟总部后,中欧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对话以增进理解,妥善处理分歧。中欧还表示要尽快召开领导人峰会。另外两个大国英国和德国则以各自的方式推进了与中国的关系。2009年1月22日,英国通过了首份对华政策文件《英国与中国:合作框架》。1月29日,中德双方通过了《中德关于共同努力稳定世界经

济形势的联合声明》。以《中欧联合声明》为指导,以英国的高调政策文件和中德的联合声明为契机,中欧关系正在走出困境。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中欧关系现在进入了一个矛盾多发期,类似的波折,可能还会不止一次出现。我们要理性对待,建立适当的危机解决机制,以防风波之后中欧关系陷入僵局。

2. 在发展中欧关系时要充分认识到欧盟的特殊性和对欧关系的复杂性

欧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政治经济组织。但同时,它内部又是27个独立主权国家。中国对欧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在于我们要恰当地处理对欧盟整体和成员国两个层面的对欧关系。一般而言,欧盟大国特别是法德英三国的对外政策取向对欧盟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具有较大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欧盟对外战略是欧盟国家集体意志的体现,欧盟大国的主导作用是有限的,大国利益在相当的程度上需服从欧盟的整体利益”^[8]。随着欧盟扩大到27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实际作用相对下降,彼此间协调的难度加大,在很多问题上英、法、德观点经常不一致。比如去年萨科奇会见达赖后表示“绝不后悔”,而为了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德、英两国则迅速调整了对华关系。欧盟中大国和小国关注的问题也往往不一样。在中非关系问题上,由于和非洲国家长期的殖民地的历史联系,英、法、德对中非关系的进展极其敏感,甚至指责中国填补了西方撤走后的真空,而新入盟的小国对此却并不关注。另外,因经济状况的不同,欧盟中不同国家的对华政策也有很大差异。2006年对产自中国和越南的进口皮鞋实施反倾销税问题上,欧盟当中的鞋业生产大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就是积极促动者,而鞋类的主要进口国瑞典、丹麦和荷兰等则先后几次对欧盟委员会的反倾销税案投了反对票。类似这样的问题还非常多,凡此种种,都要求中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多做工作,尽可能地调动欧盟和其中每个成员国的积极性,抑制其消极面,减少其对中欧关系的干扰和牵制。

3. 充分注意中美欧三方关系发生的变化,搞

好中美欧关系的协调

美国因素是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恒定因素。冷战时期,中欧关系只能作为两极背景下的“派生”关系而存在。冷战结束之后,中欧关系逐渐过渡到“自主型关系”。中欧双方都发现了对方的价值,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稳定和迅速地提升了双方关系。“9·11”事件后,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中欧接近和美欧疏离同时存在的状况,中国和欧盟虽然没有明确“联手”反对美国,但至少在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问题上“不谋而合”。最近几年,则已经同样明显地出现了中欧疏离和美欧接近同时存在的状况。中国的崛起对欧盟和美国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现实挑战和战略压力成为欧美的一个战略利益契合点。早在2005年,欧美官方就建立了“亚洲问题协调机制”,旨在一起应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对欧美共同利益和地缘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近年来,这种官方协调机制已经延伸到了学术界和智库。如何机智地破解这种欧美盟国“联手”制约中国的状况,也是我们需要好好研究的外交难题。

4. 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

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是原则性问题,也常常是影响中欧关系的两个重要问题。比起20世纪90年代,最近几年欧盟开始更经常地借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和制约中国的发展。在这些问题上,欧盟的政策和做法不能突破我们的底线,不能触犯我们的核心国家利益。2008年11月,中国宣布拒绝举行中欧峰会的原因只有西藏问题,其实是非常清晰地告诫欧洲方面,在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方面,中国绝不妥协和让步,仅此一个问题,足以影响大到拒绝举行持续了十年的中欧峰会。类似的情况,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中荷关系和中法关系中其实出现过。1981年,因荷兰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宣布将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直到1984年荷兰向中国政府保证不会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两国才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1991年因法国给台湾出售战斗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经

济政治措施,包括停止新的大型经贸项目谈判、撤销广州地铁项目谈判、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等,中法关系跌入低谷。1993年,新换届的法国政府从战略上积极评价中法关系,并于当年7月和12月两次派特使来华商谈中法关系正常化问题。最终在1994年1月,中法发表了《联合公报》,两国关系才正常化。所以,在萨科奇会见达赖后中国拒绝了中欧峰会的做法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适当的外交反应。中国外交讲韬光养晦,国际社会也觉得这个东方大国是个低调、温和的国家。这时,在涉藏、涉台等问题上的高调姿态和“强硬”做法其实通过这种巨大的态度反差,清清楚楚地警告西方人,西藏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能突破的原则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绝对不能触犯中国的底线。长此以往,欧盟才有可能真正认真地考虑我们的感受和尊重我们的利益。

5. 增进中欧人民间的了解和理解、消除双方的误解,为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近期中欧关系波折的原因部分地来自于欧洲民众对中国的不了解。萨科奇之所以不惜以取消原定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为代价去会见达赖,是因为在这件事上,他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而这个民意基础来自于不少法国人对华存在认知错位。其实,大部分欧盟国家的民众对西藏问题并无深入了解。他们了解西藏问题的途径主要是报刊、书籍、网络等,这些媒体大多不能客观公正地介绍西藏的状况,而是没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常常扭曲地报道西藏的历史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达赖往往被错误地塑造成一个宗教领袖的角色。这就造成了很大一部分欧洲人在西藏问题上

有很深的成见。这说明,西方国家缺少正确处理西藏问题的社会舆论环境。只要大的社会舆论环境不改变,类似的问题还会出现。而让这些号称民主、自由的报刊杂志逐渐校正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进而扭转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态度是一项漫长而艰辛工作。所以,这还需要中方做大量务实的、细致入微的工作,以期为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较好的民意基础。只有做好这件工作,在中欧民间持续地播撒理解和善意的种子,中欧关系才真正长期健康、稳定和顺利地发展。

注释:

[1] 欧盟委员会驻华代表处网站. <http://www.delchn.cec.eu.int/en/index.htm>.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s External Relations

[2] 周弘. 论中欧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 欧洲研究, 2004(2): 6

[3] 时殷弘. 美欧接近、中欧疏离与中国的战略需要. 现代国际关系, 2008(5): 10

[4] 李永辉. 强大的中国与变化的中欧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 2007(12)

[5] 2009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 <http://news.sina.com.cn/q/2009-02-03/1047177140199.shtml>

[6] 樊莹. 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 成就、特点与问题. 外交评论, 2008(4): 52

[7] 戴维香博(David Shambaugh). 中国与欧洲: 新兴的轴心//[美]“现代史”月刊(2004年9月号).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4(12): 12

[8] 刘文秀. 影响中国对欧外交战略定位的几个因素. 教学与研究, 2004(11): 41

(责任编辑: 张业亮)